

# 民國時期大學經學教育檢視

王應憲\*

(收稿日期：102年3月29日；接受刊登日期：102年7月29日)

## 提要

經學是傳統中國科舉時代教育的核心內容，清末推行學制改革，採納西方分科治學觀念，經學教育在讀經科得到延續。民國時期，教育部通令廢止讀經科，經書被歸併于中文、歷史、哲學等現代學科。「經學歷史」與「經學通論」課程為大學經學教育之重要內容，在四十餘高校均有開設，其普及範圍、持續時間均具有相當規模。

關鍵詞：大學、經學、經學教育、學術轉型、民國

---

\*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在 20 世紀初葉清算傳統文化的學術浪潮中，經學是最受時代詬病之學門。如陳黻宸所言「禍我中國者，經也。葛藤四連，蔓延滿道，提刀而起，絕其種子。快哉燒經！奇哉燒經！決哉燒經！智哉燒經！」表現出一種「我不憚為古人罪人，我不憚受萬世唾罵」<sup>1</sup>之決意精神。晚清政府實行新政，如廢科舉，辦新式學堂，推行學制改革，採納現代分科治學觀念等等，大學堂雖專設「經學科」，但經學終究已是明日黃花。是故民國初年，政府下達了廢止讀經之令，經學終於壽終正寢。然延續近二千年之久的經學，其精髓早已潛入中華民族的骨血而成為民族精神之重要載體，表現出頑強的生命力。廢除科舉制標志經學在制度層面的終結，其本身卻死而不亡，經學原本自立的知識體系固然被分解，其大部分內容卻被新興的中文、歷史、哲學等現代學科所吸收，構成了無「名」而有「實」的「經學教育」。

民國時期的經學教育是經學現代轉型的關鍵問題之一，筆者目力所及，學界對之關注甚少。舒大剛〈四川大學經學教育與研究的前世、近世和現世〉（《儒藏論壇》第 3 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 年）一文對民國時期四川大學的經學教育略有涉及。臺灣學者車行健先後發表〈胡適、許地山與香港大學經學教育的變革〉（《湖南大學學報》2009 年第 5 期）、〈現代中國大學中的經學課程〉（《漢學研究通訊》28 卷第 3 期，2009 年 8 月），後文深入考察了 1930 年代大學的經學教育，尤富啟發意義。筆者以為，當時大學經學教育主要在三類課程中得到延續。其一為國學概論，通過四部之學分類或在形式上稍加改造以概述經學傳統；其二為經學歷史與經學通論，闡述傳統經學歷史與思想之變遷，或以史含論，或以論概史。其三為經書選讀與專經研究，以講授十三經內容為主。「國學概論」與「經書選讀」後來成為教育部頒佈推行的課程科目。從「史」的視角來看，「經學歷史」與「經學通論」最具「史」性，故本文的進行即基於此類課程而展開，在參考前人成果的基礎上，考述經學教育的基本面相。

---

<sup>1</sup> 陳黻宸：〈經術大同說〉，《陳黻宸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6 月），頁 530。

## 二、制度建置

清末學部於 1904 年頒行《奏定學堂章程》，採納西方學術分科觀念，實行學制改革。大學堂分為經學、政法、文學、醫科、格致、農、工、商八科，經學居於八科之首，經學科又細分為周易學、尚書學、毛詩學、春秋左傳學、春秋三傳學、周禮學、儀禮學、禮記學、論語學、孟子學、理學等十一個學門，章程還對各門課程的講授內容作出概要性規定。在科學與民主思想的影響下，民國政府於 1912 年通電各省，廢止師範、中、小學讀經科。此後一年間，相繼頒行了《大學令》、《大學規程令》，明令廢止經學科。以後，經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地位已不復存在，但十三經內容卻為改制後的大學文科吸收。當時的文科下設哲學、文學、歷史學、地理學四門，哲學門「中國哲學類」將《周易》、《毛詩》、《儀禮》、《禮記》、《春秋》、《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孟子》、周秦諸子、宋理學收於麾下；文學門「國文學類」則收有《說文解字》、音韻學、爾雅學；歷史學門「中國史」有《尚書》、《春秋》、《左氏傳》<sup>2</sup>。

早期大學的課程多由學校自由開設，1929 年教育部成立大學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聘請專家制定必修選修科目，頒發各大學遵守執行。受教育部委託，1938 年朱自清、羅常培擬定《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草案》，次年修訂頒行。《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必修科目表中有「群經諸子」作為「中國文學專書選讀」內容之一<sup>3</sup>。該法令在教育界引發熱議，程千帆提出課程講授應當經史子集並重、同時以國學為主，增設「國學概論」為必修科目<sup>4</sup>。朱自清撰文回應謂「國學」是一個過渡名詞，不能表示歷史的實際和接受傳統時批評的態度，「民國以來，康梁以後，時代變了，背景換了，經學已然不成其為學；經學的問題有些變成無意義，有些分別歸入哲學、史學、文學。」<sup>5</sup> 1944 年 8 月教育部函聘專家在川東師範本部舉行課程討論會，修訂各學院科目表。汪辟疆、汪東擔任中國文學系及師範學院國文學系審查會召集人，成員有羅根澤、伍倬、魏建功、盧前、陳石珍、相菊潭、戴應觀、溫字瑞、段天炯。此次會議討論了國文學系課程建設與改組問題。汪辟疆

<sup>2</sup> 〈教育部公佈大學規程令〉，《中華民國教育新法令》（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 年），第四冊，頁 4—6。

<sup>3</sup> 《教育法令彙編》（南京：教育部 1940 年），第五輯，頁 54。

<sup>4</sup> 程千帆：〈部頒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平議〉，《國文月刊》第 1 卷第 10 期（1941 年），頁 18。

<sup>5</sup> 朱自清：〈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 年 9 月），第二卷，頁 10。

提議，中國文學專書選讀科目之「群經諸子」與「四史晉書」兩組，應當刪去「中國文學」四字及分組並下面小注，「嚴選專書二十餘部，以示標準，而括以經典、諸子、史籍、文翰、文史評五大類，俾各校於本科目開班，得以折中。」<sup>6</sup>該提案經全體大會通過，規定「專書選讀」科目列書二十五部，單開曰某書選讀，合開曰某類選讀。經典類七部：《論語》、《孟子》、《周易》、《尚書》、《詩》、《禮記》（附《大戴禮》）、《春秋左氏傳》（附《國語》、《戰國策》）。汪氏還提議增加「國學概論」為必修科目，介紹學生閱讀、研習經史舊籍，提升國學觀念。在全體大會時，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提議在「專書選讀」中附及「國學概論」，每類專書選讀時「詳論其源流、派別、涵義與前後有關諸家」，後大會通過，「國學概論」列入選修課程。

讀經問題是現代思想界討論的熱點，總體而言，各家對於中小學是否讀經存有爭議，但對於大學實行分科讀經則基本持肯定意見，即便是力主廢止經學科的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在 1912 年 4 月回答記者是否主張保全經史舊學的提問時，亦謂：「舊學自應保全。惟經學不另立為一科，如《詩經》應歸入文科，《尚書》、《左傳》應歸入史科也。」<sup>7</sup>同年 7 月，蔡氏在發表演講時重申了這一意見：「普通教育廢止讀經，大學校廢經科，而以經科分入文科之哲學、史學、文學三門，是破除自大舊習之一端。」<sup>8</sup>在經學喪失其學科地位之後，運用現代學術分類的方法整理儒家經典成為當時史學家的共識。朱希祖在 1919 年發表《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一文，提出，《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孝經》為七部最古之書，應「就各項學術分治，經學之名，亦須捐除。」<sup>9</sup>所謂捐除經學之名，在於「經之本義，是為絲編，本無出奇的意義。但後人稱經，是有天經地義、不可移易的意義，是不許人違背的一種名詞。」經學從神壇上被打倒，從崇拜的物件轉變為研究物件。所謂「分治」，意謂分科而治，「屬於文學者，須觀察其時代精神，不必注重考據；屬於哲學及各項學術者，須憑當時確實的言語，不可從事實中妄事臆測；屬於歷史及各項制度者，先須考核事實，用分析、比較、綜合的辦法，順序排比，然後以歷史、哲學及法制、經濟等科學的眼光說明之。」呂思勉對此抱持相同意見，他說：「夫以經學為一種學科而治之，在今日誠為無謂，若如朱君之說，捐除經學之名，就各項學術分治，則此中正

<sup>6</sup> 本段及以下數段，出自社員：〈修訂中國文學系科目表旁紀〉，《中國文藝》第 4 期（1944 年），頁 96-105。

<sup>7</sup> 蔡元培：〈在北京任教育總長與記者談話〉（1912 年 4 月），《蔡元培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9 月），第二卷，頁 159。

<sup>8</sup> 蔡元培：〈全國臨時教育會議開會詞〉（1912 年 7 月 10 日），同前註，頁 264。

<sup>9</sup> 本段及以下數段，皆出自朱希祖：〈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北京大學月刊》第 1 卷第 3 號（1912 年），頁 42-43。

饒有開拓之地也。」<sup>10</sup>在 1930 年代的讀經討論中，周作人提議：「大學裏——至少是北京大學應該正式地『讀經』，把儒教的重要的經典，例如《易》、《詩》、《書》一部部地來講讀，照在現代科學知識的日光裏，用言語歷史學來解釋它的意義，用『社會人類學』來闡明它的本相，看它到底是什麼東西。」<sup>11</sup>李源澄亦謂：「今日治經，言漢言宋，言今言古，皆局於一曲，不如分為語文學、歷史學、政治學、倫理學、教育學而窮究其蘊，更合史部而觀其通覽其變之為得也。」<sup>12</sup>何炳松主持的《教育雜誌》在 1935 年致函社會各界諮詢對於讀經的看法，並將回饋意見彙編為「讀經討論」專刊出版。各家基本贊同在大學開展經學教育。如蔡元培復函：「為大學國文系的學生講一點《詩經》，為史學系的學生講一點《書經》與《春秋》，為哲學系的學生講一點《論語》、《孟子》、《易傳》與《禮記》，是可以贊成的。」<sup>13</sup>安徽大學姚永樸、陳朝爵、中山大學古直、曾運乾、陳鼎忠、方孝岳極力推崇讀經，陳鐘凡、憶欽、李蒸、李權時、陳禮江等亦復函贊同大學讀經。可見在廢止經學科之後，將儒家經典的知識納入文史哲等現代學科體系，通過分科的形式系統整理經學成為時人的共識。學術分科觀念衝破了籠罩於經學之上的神聖光環，促成其步入史學化、哲學化、文學化進程。

在廢止經科之後，教育部的相關法令抑或學術界的主流意見，均主張大學以分科形式系統整理經學，將經書納入現代學科分別講授，但並非沒有不同聲音，蒙文通即對此提出質疑：「自清末改制以來，昔學校之經學一科遂分裂而入於數科，以《易》入哲學，《詩》入文學，《尚書》、《春秋》、《禮》入史學，原本宏偉獨特之經學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學術之分類衡量中國學術，而不顧經學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其實，經學即是經學，本自為一整體，自有其物件，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為後來文化之指導者也。」<sup>14</sup>經學自西漢以來成為傳統中國的主流價值觀，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產生影響。清末學制改革的分科觀念割裂了經學自立的學說體系，蒙氏意在破除經學因分科所產生的學術畛域，關注經學的整體性和系統性。作為傳統學術的重要載籍，經書之特質既如蒙氏所言的「非史」、「非哲」、「非文」，亦可謂如蔡元培指明的「亦

<sup>10</sup> 呂思勉：〈答程鷺於書〉，《呂思勉論學叢稿》（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681-682。

<sup>11</sup> 周作人：〈論八股文〉，《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年 12 月），頁 66。

<sup>12</sup> 李源澄：〈讀經雜感並評胡適〈讀經平議〉〉，《論學》第 5 期（1937 年），頁 65。

<sup>13</sup> 龔鵬程主編：《讀經有什麼用：現代七十二位名家論學生讀經之是與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7 月），頁 136。

<sup>14</sup> 蒙文通：〈論經學遺稿三篇·丙篇〉，《經學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8 月），頁 209。

史」、「亦哲」、「亦文」。西方分科觀念將經學並入文科，促成其學術轉型，衝破了籠罩於經學的神聖光環，有積極的時代意義，但負面效應確如蒙氏所言，以西學衡估中學，分化了經學思想體系的獨立性。

關於「經學歷史」、「經學通論」課程，教育部頒佈的法令中尚未見明確規定，但上述四十年代討論國文系科目時通過的一條議案值得注意，即「專書選讀」時應詳論其源流、派別、涵義與前後有關諸家。群經屬專書選讀一類，群經的源流、派別及涵義等顯然包含「經學歷史」的意味。事實上，早在 1920 年代，已有多所大學開設此類課程，學術界也對此展開了討論。1925 年魏建功在就讀北京大學中文系時致函系主任馬裕藻暨教授會，提出將「經學歷史」列入該系課程，為學生講授研治國學的門徑，據說教授會接受這一建議並於當年秋季改進了學科組織辦法<sup>15</sup>。1934 年杜鋼百向中山大學校長鄒魯提出，中文系應當設立專攻經學科目，在客觀學術史料的立場上探究古代文獻，闡述古人思想，並以《春秋》為例說明分科探究的舉措<sup>16</sup>。次年 8 月，杜氏發表《論大學課程中之經學研究》一文，最為系統地檢討經學教育的目的、課程、方法及態度問題。文中指出各大學經學課程存在兩個弊端，其一「以唐人『帖括』記誦之法，代探究研幾之事，食古不化，將使學者全成為科舉時代之人物。」其二，「以近世『文學』、『史學』、『哲學』之觀點，部勒群經，抽引一端，矜為新解，而實無以觀其全與通，篤實之士，多出此道。」經學應當設立專科教授，其價值在於「覘思維之全，鑿作述之原」、「考每代之主潮，論家法之流衍」、「較典制之異同，證大義與微言」、「明訓詁之通轉，推文法之遷嬗」<sup>17</sup>。杜氏認為，晚清學堂的經學專科在本質上承襲科舉遺制而非研究，「研究之法者，在使學者誦其條貫，明其本真，由流以溯源，因跡以求心，不雜成見，純任客觀。夫然庶可敘次眾說，各與評價，舉其時代而明其所以，意在闡述而不在信守。」研究經學之態度則應「以現代合理的科學觀點為主，不必為古人爭門戶」、「以研究批判態度為尚，不可以說教主義弊其真」。杜氏注重經學課程安排之系統性，他公開批評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有「經學通論」，卻未開設「經學史」「以明其變」<sup>18</sup>。參照日本東方文化研究學院與香港大學的課程設置，杜氏將經學課程分為群經概論、經學通史、經學研究法、專經研究四類，「群經概論，所以提其綱也。經學通史，所以明其變也，此不過略涉藩籬，借為他科研究之助耳。似為一般文

<sup>15</sup> 魏建功：《魏建功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 7 月），第五卷，頁 64。

<sup>16</sup> 杜鋼百：〈與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先生論中文系改革意見書〉，《教授與作家》第 1 卷第 1 期（1934 年），頁 2-4。

<sup>17</sup> 本段及以下數段，出自杜鋼百：〈論大學課程中之經學研究〉，《民治月刊》第 1 卷第 2 期（1935 年），頁 37-44。

<sup>18</sup> 杜鋼百：〈檢討國內大學中文系之名稱、課程及其組織〉，《新中國雜誌》第 1 卷第 5 期（1934 年），頁 7。

科所必修。若夫經學研究法，則以導其徑。專經研究，則以窮其奧。途術漸分，已近專門。」其具體經學課程設計說明如下：

表一：杜鋼百論經學課程分類

課程	年級	性質	說明
群經概論	一	必	提挈綱領，指示門徑，使學者知經學為何物，及經部著述之梗概。
經學通史	二	選	闡述經學上源流派別，及與各時代政教學術關涉之跡。
經學研究法	三	選	舉前人治經之成效，與近世科學方法，舉例示端以為啟發，此導專經研究之先路者也。
專經研究	四	選	此為窄而深之研究，須示以研究之各面，及前人已有之成績，時加以新觀點新材料之提示，使學者從事理董，有以自得。

1938年，時任北平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西北聯合大學國文系主任黎錦熙與北平師範大學國文系主任錢玄同草擬《師範大學國文系科目表及說明書》，設「經學史略」為二年級必修科目，純用歷史的、批評的態度，敘述二千餘年學術思想中心的經學之變遷及其背景與影響，並規定課程內容如下：「一，經是什麼？二，經的傳授與集合；三，兩漢之今文家；四，新莽時古文經的勃興與東漢古文家；五，漢末至唐初之今古混合派；六，從唐炎〔啖〕助經宋儒至清崔述皆不囿於成說而獨抒心得者；七，清代惠、戴兩派之考訂訓詁、名物；八，清今文家之發揮大義微言及推翻古文經。」<sup>19</sup>1941年，黎錦熙據教育部頒佈的大學規程與科目擬定《大學國文系課程實施綱要》，發表「專書選讀」之「群經」意見，再次提出「經學史略」之開設<sup>20</sup>。

### 三、課程概覽

關於經學的在近代的學科境遇，蒙季甫有云：「經學，作為一門學科，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已漸漸要退出歷史舞臺了。解放前，在少數大學裏，還有個別教授先生不時開出關於經學的課程，如『經學通論』、『經學歷史』之類，多是為中文系或歷史系的選修課。」<sup>21</sup>蒙氏認識到當時大學存有經學課程的事實，卻低估了其實際規模和影響力。以

<sup>19</sup> 黎錦熙、錢玄同：〈師範大學國文系科目表及說明書〉，《西北聯大校刊》第1期（1938年），頁47。

<sup>20</sup> 黎錦熙：〈大學國文系課程實施綱要〉，《高等教育季刊》第1期（1941年），頁132。

<sup>21</sup> 蒙季甫：〈文通先兄論經學〉，《蒙文通學記》（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11月），頁69。

下據相關資料，檢錄經學課程內容，借以考見當時大學經學教育之大概。

表二：民國時期大學經學課程檢視<sup>22</sup>

時間	學校	課程	教員	學程綱要
1922-1925 1930-1936	北京大學	經學通論	陳漢章 崔適	不分今古文之學說。 今文家學說。

<sup>22</sup> 資料來源：《國立北京大學概略》（1924）；《國立北京大學民國十八年度國文學系課程概要》；《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課程一覽》（1932—1935）；《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課程一覽》（1935—1936）；《國立北京大學總覽》（1941 年度）；《國立東南大學一覽》（1923）；《私立平民大學組織大綱》（1923 年）；《北京民國大學一覽》（1924）；黃壽祺：〈略論先師吳檢齋先生的學術成就〉；劉堅：〈羅常培〉，《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 年 8 月）；《本埠國民大學本學期之學程：周予同經學史》，《申報》（1926 年 8 月 29 日）；《本校十五年上學期各系學程一覽》；〈文科教員表 附各科目說明書〉，《國立第一中山大學校報》1927 年第 21 期；《燕京大學本科課程一覽》（1928 年度）；《大夏大學一覽》（1928 年度）；《國立成都大學一覽》（1929 年 5 月）；《國立中央大學一覽》第二種《文學院概況》（1930）；《河南大學一覽》（1930）；《國文學系課程指導書》（1930 年度）；《私立大夏大學一覽》（1931 年度）；《山東濟南私立齊魯大學文理兩院一覽》（1931）；《私立嶺南大學一覽》（1931 年度）；《國立中山大學現狀》（1934 年度）；《國立武漢大學一覽》（1932 年度）；《武昌中華大學二十周年紀念特刊》；《私立金陵大學一覽》（1932 年度，1933 年度）；《國立武漢大學一覽》（1933 年度）；《國立武漢大學一覽》（1934 年 12 月）；《國立武漢大學一覽》（1935 年）；《廈門大學一覽》（1933—1934 年度）；《廈門大學一覽》（1935—1936 年度）；《私立廈門大學一覽》（1936—1937 年）；《河北女子師範學院一覽》（1934 年度）；《國立北平師範大學一覽》（1934）；《國立北平大學一覽》（1934）；《私立中國學院概覽》（1934）；《國立中山大學現狀》（1934 年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章程》（1934）；《北平輔仁大學文學院概況》（1935 年度）；《北平中法大學一覽》（1935）；《國立山東大學一覽》（1935 年度）；《山大週刊》（1935 年 9 月）；《光華大學十周紀念冊》（1935 年 6 月）；《私立光華大學章程》（1936 年 8 月）；《私立東吳大學文理學院一覽》（1936 年度）；《安徽省立安徽大學課程說明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1935 年度）；《安徽大學一覽》（1936 年度）；《國立四川大學一覽》（1936）；《省立雲南大學一覽》（1936 年度）；陳君葆著，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4）；《北平私立燕京大學一覽》（1937 年度）；《北平私立燕京大學一覽》（1937 年度）；《聖約翰大學一覽》（1937—1938 年度）；《湖南大學概覽》（1937 年度）；《私立之江文理學院一覽》（1937 年度）；郭查理著，李瑞明譯：《嶺南大學簡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年）；《顧頡剛日記》（臺北：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年 5 月），第六卷；黃漢文：〈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江蘇文史資料集粹教育卷》（南京：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2 年）；〈湯志鈞自傳〉，《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 年），第九輯；《大夏大學學生手冊》（1940 年 1 月）；梁世熙：《今日各大學的介紹及 1940 年各校入學試題》；《私立北平輔仁大學一覽》（1942 年度）；《國立北京師範大學一覽》（1942）；金景芳〈自傳〉，《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傳略》（太原：晉陽學刊編輯部，1982 年 10 月），第一輯；《中國大學概覽》（1943 年）；《國立上海大學要覽》（1943 年度）；《國立雲南大學一覽》（1947 年度）；《國立山東大學概覽》（1948 年度）。

時間	學校	課程	教員	學程綱要
1941		經學史	馬裕藻	先述孔子作經之始末，次就兩漢博士之師傳，劉歆古文之偽跡以及鄭玄以降雜糅今古文諸端，分別敘列。至宋儒疑古之精神，清儒考訂之特色，凡關於經學者亦略具於篇，而以劉逢祿、龔自珍、魏源、邵懿辰、康有為、崔適諸家之說終焉。
1923	東南大學	群經通論	陳鐘凡	
	平民大學	經學通論		
1924	民國大學	經學通論		
1925	中國大學	經學通論	吳承仕	經名數略釋第一，群經原始第二，群經傳授第三，漢魏博士第四，群經篇目第五，今古文第六。
1926	廈門大學	經學通論	羅常培	
	上海國民大學	經學史	周予同	
1927	第一中山大學	經學史	羅常培	用歷史的方法，敘述經學之起源，傳授，派別及演變，以明今後研治經學之途徑。暫用皮錫瑞《經學歷史》為參考書，另發講義大綱。
1928	燕京大學	經學史	馬裕藻	孔經維與晚周諸子等列，然對於國人之思想，關係較深，故歷代遞傳，研究日眾，惟是傳者紛歧，遂令經文失真，經旨轉晦，茲編先述孔子作經之起源，次詳歷代傳經之真相，以冀稍得孔子作經時之經旨，庶不為後世傳經家之說所混淆，至孔子之學說批評，則非茲編所及。暫用皮錫瑞《經學歷史》為教本（商務印書館有石印本），臨時再由學生筆錄講義。
	大夏大學	群經通論		
1929	成都大學	經學通論	蒙文通	
1930	中央大學	經學通論	黃侃	專論六藝起源傳授之派別與群經之大義，其他經學上之重要問題在《國學概論》中不及詳者專章論列。
	河南大學	群經要略		就群經之要義源流派別，及各種刊本，授以概要，使知讀書之門徑。
	郁文大學	經學史	馬裕藻	
1931	大夏大學 文學院國學系	群經通論	陳鐘凡	分上下兩篇，分論各經之起源、義例、精蘊、傳授，下篇綜論經之為教，經之為用，經之興衰，經之流派，治經之法。
			用簡明之講述，通論《易》、《詩》、《書》、《禮》、《春秋》、《論語》、《孝經》、《爾雅》、《孟子》群經之大凡，指導學者以研究之門徑。	
	齊魯大學	經學入門		說明諸經大義，研究方法，及諸經源流派別概要。
		經學史		講述經學之發生及成立，兼述各家之特點。
嶺南大學	經學通論	容肇祖	以簡明提要之方法，研究儒家群經之淵源及其重要思想。	

時間	學校	課程	教員	學程綱要
1932	中山大學	經學歷史		
		經學通論		
	武漢大學	經學概論	張西堂	先講述群經名稱，緣始，次第，分合，傳授，今古文學之異同，漢魏博士之家法，唐宋以來迄明清治經者之流別、態度與方法，使學者於各經略知其宗旨內容，以為進研經書之準備。
	中華大學	經學概論		講授群經義例，今古文家法，漢宋異同，治經方術，以為研究專經之準備。
經學史			講授經學之起源及其變遷。尤注重清代各專家之整理經過。	
	金陵大學	經學通論及經學史	黃侃	講述六藝之起源傳授之派別與群經之大義及歷代經學之興廢。
1933-1936	武漢大學	經學概論	劉異	以論為經，以表為緯。先總論經之名義，體性，源流，傳授，真偽，盛衰，治經，致用，使得一總括之概念。次分論、經、傳，內容特殊之點，使略知個別之要義。終以經緯，經子，經文，使知經與群書之關係。再緯之以經數，篇目，義數，傳授，石經，經文異同，今古文異同，及他各概表。以期學者於經學獲一整個之常識，以為進研究專經之基礎。
1933-1937	廈門大學	經學通論		講授古今文學家師說之系統，及其治學之精神。
1934	河北女子師範學院	經學源流		以陸氏《經典解文序錄》，及皮氏《經學歷史》為主，講明經學之起原，及兩漢以迄陳隋之變遷沿革。並略述群經之重要著述，二家疏失之處，亦隨事舉正焉。
	北平師範大學	經學史略	錢玄同	經是什麼；經的傳授和集合；西漢的今文家；新莽時古文經的勃興和東漢的古文家；漢末到唐初的今古混合派；從唐啖助到清崔述，他們都是不囿於舊說而獨抒心得的；清代惠、戴、兩派之考訂訓詁名物；清今文家之發揮大義微言及推翻古文經。
	北平大學	經學通論		略示經學門徑，使學者藉以追溯本原，知一切學術文學所自出。
	中國學院	經學源流		
	中山大學	經學通論	吳三立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群經選讀		研究經學概要，並選讀其中文字之優美者。
1935	輔仁大學	經學通論	余嘉錫	九經三傳，為一切學問根柢，但義蘊宏深，其書亦浩如煙海；學者欲窺門徑，不可不知其源流大略。皮錫瑞《經學歷史》，敷陳詳贍，今故取以為教材。然皮氏主張今文學，不免多所穿鑿，講授之時，當旁引群書，加以糾正。多聞闕疑，無取便辭巧說也。
	中法大學	經學通論	齊震	講授中國經部大要。約分兩項：一述群經緣起及其篇卷流傳分合存佚；二述經學家源流並略及治經之方法。
	山東大學	經學概論		講述經學之源流家數及其盛衰之跡，並討論關於斯學之各種問題與其影響，更臨時提示群經中之重要思想，以明儒學之旨趣。
經學史		游國恩		

時間	學校	課程	教員	學程綱要
1935-1936	光華大學	經學史		
1936	東吳大學	經子概論		講授群經之源流諸子之要略，注重於閱讀校勘之方法。課本：范文瀾著《群經概論》。
	安徽大學	群經概論		目標在使學生明瞭中國經典之內容，並獲得對於經學之合理的正確的觀念。分導論、各論兩部分。導論部分敘述經的定義、領域、次第及學派等。各論部分述群經之來源、內容、派別及其特殊問題等。
		經學通史	姚永樸	目標在使學生明瞭經學之產生與嬗變，對於中國學術思想作進一步之專門研究。內容分前編、本編兩部分。前編敘述學派分期及經學上之根本問題，使學生對於經學史作一鳥瞰。本編或分期敘述，或分經敘述，務使學生對於經學之產生與嬗變，探求其社會的原因，而能超越傳統的儒教觀念。
	四川大學	經學通論	龔道耕	略述經學綱要及其傳授源流，歷代派別並講明經學與史傳諸子之異同及其與中國文化之關係，俾學者樹立治經之基礎。
	雲南大學	中國經學史		講述中國經學之地位，及各時代研究經學之方法與態度，尤注意於今古文學與漢宋學之異同。
	香港大學	經學通論	區大典	
1937	燕京大學 文學院國文學系	經學史	錢穆	講經之起源與歷代傳經之真相。
	顧頡剛			
	聖約翰大學	群經大要		
	湖南大學	經學概論		
	之江文理學院	經學通論		暫用皮錫瑞《經學通論》為課本，以為溝通群經之津梁。
1937-1938	嶺南大學	經學通論		
1938-1939	雲南大學	經學史	顧頡剛	
1939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經學概論	周予同	
1940	大夏大學	群經選讀		
約 1940	燕京大學	經學史		
	輔仁大學	經學通論	劉盼遂	
1942	北京師範大學	群經大義		
	東北大學	經學概論	金景芳	
1943	中國大學	經學通論		
	上海大學	經學通論		
1947	雲南大學	經學史	顧頡剛	
		經學通論	李源澄	
1948	山東大學	群經概論		

#### 四、基本特點

據上表所示，多所高校開設「經學歷史」、「經學通論」課程，以北京、上海、江蘇三地居多，涵蓋國立、省立、私立、教會各類大學，在時間上具有持續性，即便在國運維艱的抗戰時期亦未中斷。需要指出的是，經學教育在大學得到相當程度的推行，但其社會反響卻未可高估。以實行經學教育最為持久的北京大學為例，京師大學堂時代雖專設經學科，但風靡一時的是新學，《飲冰室文集》、《新民叢報》幾乎人手一編，成為普通讀物，《富強叢書》，《瀛環志略》最為通行<sup>23</sup>。此後，崔適開設選修課「五經釋要」，聽課者寥寥無幾<sup>24</sup>，馬裕藻講授「經學史」，雖有屈萬里慕名求學，申請作為插班生前去聽講，也僅是個別現象<sup>25</sup>。

現代大學國文系以「對中國舊文學的整理結算，對中國新文學的創造建設」為目標<sup>26</sup>，經學自然是舊文學整理的應有之義，也因之成為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或師範學院國文系的基礎課程，亦為極少數的哲學系、歷史系列入選修範圍，如上海國民大學哲學系、史學系以及光華大學歷史系的「經學史」，輔仁大學哲學系的「經學通論」等。值得注意的是，安徽大學還開設了以地域性經學流派為關注對象的專門課程「皖派經學」<sup>27</sup>。

由於資料掌握的局限，上述統計難免疏漏，但依然可以看出經學教育的基本情況，以下從地域特色、教員群體、經學教本、域外因素等方面分別敘述。

（一）地域特色。自廖平《今古學考》、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出，崔適、張西堂繼之作《史記探源》、《春秋復始》、《穀梁真偽考》等，今文學說在民國學術界盛極一時，「中國今日，滔滔者皆是今文學家之末流，多流於新奇僻論，言經學而抹煞經籍也。」<sup>28</sup>從民國學界的實際情況來看，晚清經今古文之爭餘波未曾消歇，並折射於大學經學教育。周予

<sup>23</sup> 王道元：〈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參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1月），頁19。

<sup>24</sup> 顧頡剛：〈記崔適先生〉，參顧洪編：《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4月），頁321-323。

<sup>25</sup> 屈費海瑾：〈屈萬里先生的治學與史語所〉，《屈萬里書信集 紀念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9月），頁241。

<sup>26</sup> 丁易：〈論大學國文系〉，《國文月刊》第39期（1945年），頁2。

<sup>27</sup> 安徽大學文學院編：《安徽省立安徽大學課程說明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1935年度），頁26。

<sup>28</sup> 晞：〈新書介紹〈中國經學史概說〉〉，《圖書月刊》第2卷第2期（1942年），頁37。

同將五四以後經學的傳承者分為兩派：或繼承孫詒讓、章炳麟的學派堅持古文經學，或宣揚廖平、康有為的論點專主今文經學，「他們在高等學校的講壇上有些勢均力敵，大概南方各校主『古文』的多，北方各校主『今文』的多。」<sup>29</sup>1930年錢穆談及北京經學教育狀況云「故都各大學本都開設經學史及經學通論諸課，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sup>30</sup>，其晚年則更明確地指出，民國初年，雖有新文化運動，北大、清華、燕大、輔仁、師大等學校均開設經學史及經學通論諸課，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儘是疑古辨偽，一筆抹煞，與新文化運動相呼應<sup>31</sup>。錢穆、周予同當時均在南北高校開設經學課程，與文史界交流密切，其南方主「古文」，北方主「今文」的看法具有相當的可信度。從北方大學的經學教育來看，崔適、馬裕藻、顧頡剛、錢玄同分別擔任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主要高校的經學教員，以今文經學思想闡述疑古學說，這一點在各校經學課程學程綱要中得到證實。南方高校的經學教育以中山大學為代表，古直、曾運乾、陳鼎忠、方孝岳等教員在講授經學課程中均力主古文之說。

（二）教員群體。民國時期大學經學教員的學者有崔適、陳漢章、蒙文通、龔道耕、李源澄、馬裕藻、黃侃、余嘉錫、顧頡剛、錢玄同、張西堂、周予同、劉盼遂、羅常培、陳鐘凡、劉異、區大典、杜鋼百、齊震、金景芳、蔡尚思<sup>32</sup>等，已具有相當規模。從經學教員的師承來看，大學的經學教育與晚清經學存在明顯的學術傳承。崔適、陳漢章、姚永樸、蒙文通等屬以經學家充任經學教員的學者，其講授主旨帶有明顯的經學立場。如崔適與陳漢章同在北京大學講授「經學通論」，主旨分別為今文家學說與不分今古文之學說。蒙文通在成都大學以今文講解「經學通論」，姚永樸在安徽大學講授「經學通史」等。由於經學立場的不同，經常產生學術爭論。如崔適、劉師培同在北京大學任教，一主今文，一主古文。據說二人校內住所恰好對門，朝夕相見，見面恭敬客氣，互稱某先生，並伴以一鞠躬，但在課堂講授時總要攻詰對方荒謬而毫不留情<sup>33</sup>。在經學教員中，太炎門生主持南北多所高校教席，地位舉足輕重，如馬裕藻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郁文大學講授「經學史」，錢玄同在北平師範大學講授「經學通論」，黃侃在中央大學、金陵大學講授「經學

<sup>29</sup> 周予同：〈周予同自傳〉，《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7月），第一輯，頁235。

<sup>30</sup> 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9月），頁160。

<sup>31</sup> 錢穆：《師友雜憶》，《錢賓四先生全集》，第五十一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5月），頁163；錢穆口述，胡美琦、何澤恒、張蓓蓓整理：《經學大要》，《錢賓四先生全集》，第五十二冊，頁267。轉引車行健：〈現代中國大學中的經學課程〉，《漢學研究通訊》第28卷第3期（2009年8月），頁21。

<sup>32</sup> 《蔡尚思自傳》（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12月），頁40。

<sup>33</sup> 張中行：〈紅樓點滴〉，同註24，頁431。

通論及經學史」，吳承仕在中國大學講授「經學通論」。同為章氏弟子，各家在學術觀念上分歧很大，沈尹默將章門弟子分為三派，「一派是守舊派，代表人是嫡傳弟子黃侃，這一派的特點是：凡舊皆以為然。第二派是開新派，代表人物是錢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稱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間派，以馬裕藻為代表，對其他兩派依違兩可，都以為然。」<sup>34</sup>

（三）經學教本。自西漢設立經學博士到晚清廢科舉，傳統經學有著兩千多年的歷史。關於其傳授源流，《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均有記載，四庫館臣「儒者沿革，學凡六變」的意見已蘊含經學史的分期意識。然而，對這門學科淵源流變與思想內涵進行全面清理，卻是近百年來的事。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通論》與劉師培《經學教科書》被推為初期典範之作。皮著《經學歷史》是第一部完整意義上的經學史著作，「經學古無史，有之，自此書始」<sup>35</sup>，因此被學界視為研習經學必讀之作。錢基博、呂思勉列舉經學入門讀物均首推之<sup>36</sup>，王先獻認為皮著「示學者以經學之沿革，開經史之先河，其功究不可沒。」<sup>37</sup>商務印書館將之列入「學生國學叢書」，由周予同標點注釋出版，流傳廣泛。馬裕藻在燕京大學、羅常培在中山大學講授「經學史」、余嘉錫在輔仁大學、黃侃在中央大學講授「經學通論」<sup>38</sup>以及河北女子師範學院「經學源流」均採用此書作為教材。顧頡剛則擬校注皮氏《經學通論》以作為大學課本<sup>39</sup>。當然，皮著並非惟一的參考書，杜鋼百在武漢大學講授《經學概論》就直接採用章太炎《國故論衡·原經》與劉師培《經學教科書》<sup>40</sup>。東吳大學「經子通論」講授群經源流時，則以范文瀾的《群經概論》為教本<sup>41</sup>，周予同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講授「經學概論」則將其同名著作列為參考書<sup>42</sup>。

在大學堂時期，為了配合學堂經學科的教學需要，已有意編纂通論性經學教本。1902年《大學堂謹擬編書處章程》規定：「經學課本，除《四書》、《五經》分年誦習外，其諸家注釋，擬編纂《群經通義》一書，略仿《爾雅》之例，天地人物，禮樂政刑，類別部居，

<sup>34</sup> 沈尹默：〈我和北大〉，同前註，頁166。

<sup>35</sup> 王先獻：〈〈經學歷史〉書後〉，《學生文藝叢刊》第2期（1934年），頁15。

<sup>36</sup> 錢基博：〈近代提要鈞玄之作者〉，《光華年刊》（1934年），頁1；呂思勉：〈論讀經之法〉，《經子解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頁6。

<sup>37</sup> 王先獻：〈〈經學歷史〉書後〉，頁15-16。

<sup>38</sup> 程千帆、唐文編：《量守廬學記》（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8月），頁142。

<sup>39</sup> 《顧頡剛日記》（1939年12月21日），第四卷，頁322。

<sup>40</sup> 趙彥青：〈杜鋼百傳略〉，《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七輯，頁219。

<sup>41</sup> 《私立東吳大學文理學院一覽》（1936年度），頁57。

<sup>42</sup> 黃漢文：〈無錫國學專修學校〉，頁139。

依次序列，務取簡賅，不求繁富。其大義微言，師承派別，亦區分門目，略加詮次，要必符合普遍之義，取資誦習，為通經致用之先，無取乎漢宋專家探微騁博之業也。」<sup>43</sup>由此，在各大學堂出現了一批經學教本。如王舟瑤的《京師大學堂經學講義》<sup>44</sup>、甘鵬雲的《京師優級師範學堂經學講義》<sup>45</sup>、潘任的江南高等學堂《經學講義》<sup>46</sup>以及姚永樸的安徽高等學堂《十三經述要》<sup>47</sup>。學堂教學以「中體西用」為宗旨，講求「中西並重，觀其會通」<sup>48</sup>。在這一理念的觀照下，學堂經學講義存在以經學比附西學傾向，若王氏之《京師大學堂經學講義》即為此類。當時教育部頒行的法規中亦未見到對經學教本的規定，商務印書館在三十年代參酌各大學一覽及課程表，折衷印行《大學叢書目錄》，其中文學系「目錄學」列有江俠庵譯本《先秦經籍考》，哲學系「中國儒學史」列有呂思勉《理學綱要》<sup>49</sup>，正式地提出教本選擇問題。

大學教員在回顧、反思經學的歷史與思想時，多自發編纂講義以備課堂講授之用，因此出現不少經學教本。如陳漢章《經學通論》（北京大學排印本）、吳承仕《經學通論》（中國大學講義，1925年）、陳鐘凡《經學通論》（東南大學1923年鉛印本）、龔向農《經學通論》（成都薛氏崇禮堂1926年刊本）、周予同《群經概論》（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樂調甫《經學概論》（齊魯大學1933年石印本）、張西堂《經學史講義》（武漢大學油印本）、馬裕藻《經學史》（北京大學）、姚永樸《經學舉要》（安徽大學文學院）、劉異《六藝通論》（《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941年第7卷第1-3期）等，這些講義大體反映了經學教育的水準與成就。

（四）域外因素。近代以降，日本成為國際漢學研究重鎮之一，相較在國內學術界遭冷遇的經學，反獲得日本漢學家的關注與青睞。服部宇之吉曾就北京大學廢止講經一事向蔡元培提出質疑<sup>50</sup>。吉川幸次郎在留學中國的第一年即旁聽馬氏「經學史」<sup>51</sup>，他還與倉

<sup>43</sup> 〈大學堂謹擬編書處章程〉，朱有瓛：《中國近代學制史料》（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6月），第二輯上冊，頁861-864。

<sup>44</sup> 王舟瑤：《京師大學堂經學講義》（北京：學務處官書局，1904年）。

<sup>45</sup> 甘鵬雲：《京師優級師範學堂經學講義》，油印本。

<sup>46</sup> 潘任輯：《經學講義》（南京：江南高等學堂，1908年）。

<sup>47</sup> 姚永樸：《十三經述要》（秋浦：錦記書局，1925年）。

<sup>48</sup> 北京大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京師大學堂資料選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8月），頁29。

<sup>49</sup> 《大學叢書目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5、11。

<sup>50</sup> 吳虞：〈對於祀孔問題之我見〉，趙清、鄭城編：《吳虞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頁239-240。

<sup>51</sup> 吉川幸次郎著，錢婉約譯：《我的留學記》（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9月），頁48-49。

石武四郎在中國大學旁聽吳承仕「三禮名物」與「經典序錄」<sup>52</sup>。當時有不少域外經學史著作經譯介傳入中國，最具代表的當屬本田成之的《支那經學史論》、諸橋轍次編輯的《經學史》以及瀧熊之助的《支那經學史概說》。《支那經學史論》於1927年東京吉川弘文館出版，傳入中國之後有江俠庵、孫俚工的兩個譯本。江譯本1934年5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譯名《經學史論》，翌年3月再版。孫譯本1935年由中華書局出版，譯名《中國經學史》，全書依章節體劃分為經學的起源、經學內容的成立、秦漢的經學、後漢的經學、三國六朝的經學、唐宋元明的經學、清朝的經學七章，書內有眉批提要 and 注釋，後附「中國經學史年表」<sup>53</sup>。安井小太郎、諸橋轍次、小柳司氣太、中山久四郎合著，諸橋轍次編輯的《經學史》於1933年10月由東京松雲堂書店出版。諸橋轍次以為，「不論在中國和日本，好像還沒有像樣的經學史。」<sup>54</sup>故而根據大東文化學院志道會研究部講習筆記匯輯而成《經學史》。1936年王古魯《最近日人研究中國學術之一斑》一書在介紹大東文化學院時談及《經學史》成書過程：「昭和七年，適值學院成立十周年之期，因此學院裏面志道會研究部中，為紀念起見，就自九月起，公開設立一『經學歷史講會』。每一講題，預訂講四小時（中山氏的講義，則預訂八小時），每星期約占二小時，連續至十二月中旬完畢。……其後，志道會研究部即將演講詞刊佈，定名為經學史。」<sup>55</sup>《支那經學史概說》1934年10月在東京大明堂書店出版。1941年8月，長沙商務印書館出版陳清泉譯本《中國經學史概說》，其章節體，分緒論、經書、西漢之經學、東漢之經學、魏晉南北朝隋之經學、唐宋之經學、元明之經學、清代經學八章，涵蓋經學源流、成立、派別、人物、內容、經書等方面。這些經學史譯著出版不久即在中國學界引發反響。江氏譯本《經學史論》刊行未及半年，《大公報·圖書副刊》刊發署名「一之」所作書評。1936年8月周予同評價本田成之的中國經學史，「其優點在於不受中國傳統的經學偏見所蒙蔽，其缺點在於對中國經學的修養不夠而多主觀武斷的話。」<sup>56</sup>1937年6月3日《大公報·圖書副刊》第184期發表關於孫氏譯本的書評。1942年2月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刊發署名「晞」所作「新書介紹」，推介陳清泉譯本《中國經學史概說》<sup>57</sup>。

<sup>52</sup> 倉石武四郎著，榮新江、朱玉麒輯注：《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4月），頁11。

<sup>53</sup> 本田成之著，孫俚工譯：《中國經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

<sup>54</sup> 安井小太郎、諸橋轍次、小柳司氣太、中山久四郎合著，諸橋轍次編輯，林慶彰、連吉清合譯：《經學史》（臺北：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6年10月），頁13。

<sup>55</sup> 王古魯：《最近日人研究中國學術之一斑》（常熟：自印本，1936年），第一冊，頁72-73。

<sup>56</sup> 周予同：《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皮錫瑞〈經學歷史〉序》，《民鐸雜誌》第9卷第1號（1928年），頁5。

<sup>57</sup> 晞：〈新書介紹〈中國經學史概說〉〉，《圖書月刊》第2卷第2期（1942年）。

域外經學史著作的譯介與傳播引發時人對於經學史研究的檢討。周予同在《支那經學史論》出版次年撰文謂：「以具有二千餘年之經學研究的國度，而整理經學史料的責任竟讓諸異域的學者，這在我們研究學術史的人，不能不刺骨地感到慚愧與恥辱了。」<sup>58</sup>一之則呼籲加快整理經學史以賡續絕學：「我希望有志於研究經學的人們，一方面趕快作部分的考究，一方面更趕快地作系統的整理，而最好在短期內能有較正確的作品來。否則像這樣繁難的經學這一學科，在中國固然不致擔保其必能保存，而在日本恐怕也難擔保其必能保存罷！」<sup>59</sup>

## 五、結論

作為傳統文化主幹的經學，影響了二千年來的社會道德與價值觀。在經書不再成為學校教育的指定教材之後，如何改造經學，使之順應現代知識體系，一直是當時學人思考的問題。顧頡剛、錢玄同、張西堂為代表的疑古學者抉發章學誠「六經皆史」說以及晚清今文家思想，在新史學建設中倡言把經書還原為史料，經學研究呈現出史學化趨向。錢玄同提出研究經書應當破除師說與家法的門戶之見，經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學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國故史料。」<sup>60</sup>周予同推衍章學誠的觀點，明確提出「六經皆史料」<sup>61</sup>。顧頡剛、周予同尤其重視“經學史”的清理工作。顧氏在1928年給楊向奎的信中提出「作『經學史』，為系統之敘述，以顯示歷代經學家之真相與其價值。」<sup>62</sup>他還閱讀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注釋皮錫瑞《經學通論》以為寫作「經學史」的參考<sup>63</sup>。周予同則斷言，傳統經學在五四新文化中動搖，必將消逝於不久的將來，「現在經學之繼承的研究大可不必，而經學史的研究當立即開始。因為他一方面使二千年的經學得以結束整理，他方面為中國其他學術闢一條便利的途徑。」<sup>64</sup>周氏注釋出

<sup>58</sup> 周予同著，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頁92。

<sup>59</sup> 一之：〈書評〈經學史論〉〉，《大公報·圖書副刊》（1934年9月8日）。

<sup>60</sup>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國學季刊》第2期（1932年），頁242、313。

<sup>61</sup> 同註60，頁622。

<sup>62</sup> 同註25，頁296-297。

<sup>63</sup> 同前註，頁295。

<sup>64</sup> 同註56，頁5。

版皮錫瑞《經學歷史》，並提出系統的經學史著述計畫<sup>65</sup>。現代疑古學者的經學史研究極大地推進了大學經學教育。

近代中國經歷了社會大變革，思想界同樣如此，中學與西學並見，舊觀念與新思潮雜陳，以至有學者發出「新失其新，舊失其舊，旁皇歧路，莫知所歸」<sup>66</sup>之感慨，思想之演進在中與西、新與舊的矛盾衝突中不斷前行。傳統是現代無法割棄的歷史記憶，在舊的政治制度與思想體系瓦解之後，作為傳統教育內核的經學失去其依附載體，在現代學術門類中喪失了獨立的學科地位。在經歷新文化運動、疑古思潮與國故整理的洗禮之後，教育界對於經學的承繼並未徹底中斷，其歷史與思想在抉發與更新中完成轉型。理清民國時期經學教育的遞嬗歷程，考察經學課程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演變，考量現代知識與制度轉型中經學的境遇，對於我們客觀認識經學教育納入當下教育體制的可行性，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經學教育是那個逝去年代關注的焦點，同樣是當下不應漠視的問題。

---

<sup>65</sup> 同前註。

<sup>66</sup> 同註 13，頁 58。

## 徵引文獻

- 一之：〈書評〈經學史論〉〉，《大公報·圖書副刊》（1934年9月8日）。
- \* 丁易：〈論大學國文系〉，《國文月刊》第39期（1945年），頁2。
- \* 王古魯：《最近日人研究中國學術之一斑》（常熟：自印本，1936年）。
- \* 王先獻：〈經學歷史書後〉，《學生文藝叢刊》第2期（1934年），頁15。
- \* 王舟瑤：《京師大學堂經學講義》（北京：學務處官書局，1904年）。
- 本田成之著，孫俚工譯：《中國經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
- \* 甘鵬云：《京師優級師範學堂經學講義》，油印本。
- 連吉清合譯：《經學史》（臺北：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6年10月）。
- 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
- \* 呂思勉：《經子解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
- \* 呂思勉：《呂思勉論學叢稿》（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
- 李源澄：〈讀經雜感並評胡適〈讀經平議〉〉，《論學》第5期（1937年），頁65。
- 杜鋼百：〈論大學課程中之經學研究〉，《民治月刊》第1卷第2期（1935年），頁37-44。
- \* 姚永樸：《十三經述要》（秋浦：錦記書局，1925年）。
- 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1月）。
- \* 陳黻宸：《陳黻宸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6月）。
- 晞：〈新書介紹〈中國經學史概說〉〉，《圖書月刊》第2卷第2期（1942年），頁37。
- 程千帆：〈部頒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平議〉，《國文月刊》第1卷第10期（1941年），頁18。
- 蒙文通：《經學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 \*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9月）。
- 潘任輯：《經學講義》（南京：江南高等學堂，1908年）。
- 黎錦熙：〈大學國文系課程實施綱要〉，《高等教育季刊》第1期（1941年），頁132。
- 魏建功：《魏建功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
-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臺北：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5月）。

（說明：徵引文獻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ai, Yuan-pei. *Cai Yuan-Pei Quan Ji* (Beijing:Zhong Hua Book Company,1984)
- Chen, Fu-chen. *Chen Fu-Chen Ji* (Beijing:Zhong Hua Book Company,1995)
- Ding, yi. “Lun Da Xue Guo Wen Xi”, *Guo Wen Yue Kan*, 39 (1945),pp.2.
- Gan, Peng-yun. *Jing Shi You Ji Shi Fan Xue Tang Jing Xue Jiang Yi* (Mimeograph)
- Lv, Si-mian. *Jing Zi Jie Ti*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6)
- Lv, Si-mian. *Lv Si-mian Lun Xue Cong Gao*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6)
- Wang, Gu-lu. *Zui Jin Ri Ren Yan Jiu Zhong Guo Xue Shu Zhi Yi Ban* (Changshu:Zi Yin Ben,1936)
- Wang, Xian-xian. “Jin Xue Li Shi Shu Hou”, *Xue Sheng Wen Yi Cong Kan*,2 (1934) ,pp.15-16.
- Wang, Zhou-yao. *Jing Shi Da Xue Tang Jing Xue Jiang Yi* (Beijing: Xue Wu Chu Guan Shu Ju,1904)
- Yao, Yong-Pu. *Shi San Jing Shu Yao* (Qiupu:Jin Ji Book Company,1925)

# The Classics Teaching in College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g, Ying-xian

( Received March 29, 2013; Accepted July 29, 2013 )

## Abstract

Classics was the cor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classics Teaching developed through curriculum of classics after the Tsing Dynasty reformed the education. In the early ROC, the Education Ministry abolished the classics and integrated it to Chines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The history of the Classics” and “On the Classics” was initiated in 40 colleges as the important education. That made sense in the range and duration.

Keywords: colleges, classics, classics teaching,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